

城里寻爱寻不着,返乡相亲相不中

打工男青年:城乡之间何处觅良缘?

《工人日报》陈曦

“10天安排了8场相亲,初六那天见了3位女孩。”今年春节,28岁的山东小伙王振东忙坏了。在天津打工11年,他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女孩,父母发动亲朋在家乡牵线搭桥,却也屡屡碰壁。王振东很无奈,“很多老乡情况类似,我们的幸福到底在何方?”

记者采访发现,受制于高额彩礼、“婚姻梯度”等多重因素,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在婚恋市场上愈发居于劣势。他们在城市择偶的机会有限,不得不回归传统婚恋圈,而返乡相亲的竞争同样渐趋激烈。很多青年徘徊于城乡之间,最终陷入“无妻可娶”的尴尬境地。

进城:自由恋爱机会寥寥

“2月14日那天,我派送了9单鲜花。”作为一名外卖骑手,穿梭在浪漫的氛围中,王振东却难掩落寞,“我家境一般,只有初中学历,城里姑娘看不上我,农村姑娘也把我当备选。”

与父辈不同,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以未婚状态进入城市,也跃入了更大的婚恋圈。在“男高女低”的梯度婚姻模式下,女青年借由务工获得了更大选择权,男青年则因此陷入更严峻的择偶困境。

王振东经历过两场失败的恋爱,女方给出的分手理由很一致,“你赚得太少,我们没有未来”。而光是谈恋爱花销已让他囊中羞涩,每次约会,王振东都会下意识在心里掂量费用,“一杯奶茶20元,要送1小时外卖,一场电影60元,要送3小时外卖……”

在杭州一家餐厅做服务员的乔玲玲,刚拒绝了一位农村小伙的表白:“我想在杭州扎根,而不是只度过人生的上半场”。作为农民工子女,乔玲玲也深知留守的滋味,不愿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。

“虽说进了城,圈子却比以前还小。”湖北小伙沈维安今年31岁,在北京做家具安装,他把自己的单身归因于工作。“初来乍到换工作很频繁,周边的异性不固



图源:站酷

定,也没底气谈恋爱。现在这行全是男生,工作脏、苦、累,吃住都在公司,很少有闲暇时间,又根本接触不到女孩。”

沈维安跟同村的老乡交流过,他们普遍从事快递、建筑等“同性聚集”的行业,很多人都和他有一样的困惑。

返乡:相亲择偶困难重重

男青年无法在城市找到爱情,只能将目光重新转向农村,返乡择偶成为主流选择。然而,竞争者众多和高涨的彩礼堪称两大“拦路虎”。

今年大年初五,江苏徐州邳城河一相亲大会现场,百余位男士排起长队,而女士则只有5人。沈维安对这种景象并不陌生,“同龄女生基本都结婚了,还有不少人远嫁外地,男生则剩下一大堆,每次回家相亲,只有任人挑选的份儿”。

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分析称,在农村,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,加之“传宗接代”等观念的影响,适婚男青年数量众多。

由此,女性掌握了婚姻市场的主动权,男性的结婚成本也一路攀升。去年刚结婚的河南小伙张涛,不仅用光了家里的积蓄,还欠下不少外债,被朋友调侃“因

婚致贫”。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,“在县城买房子花了48万元,媳妇家要了16万元彩礼,再加上定亲、办酒席,从相亲到领证期间去丈人家走动,总共花了近75万元。”

这笔巨款令王振东感到无望,同样让他心生抵触的,还有相亲这种模式本身。“两个人见几次面就定亲,然后便各奔东西,每逢节假日才能短暂相处,到结婚那天都不熟悉,更谈不上情投意合。”

对女青年来说,城市婚恋风气的影响还表现为:不婚主义者日益增多,这也加重了适婚女性的“供不应求”。

解局:创造更好婚育条件

多位受访专家表示,实现婚姻突围的前提是,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。进一步淡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区隔,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,使他们在就业、医疗、养老等方面享有平等权益,扫清择偶路上仍存的制度障碍。

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齐嘉楠认为,在社会层面,应破除天价彩礼、喜事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,构建新型婚育文化;倡导年轻人树立正确婚姻观,不以金钱为标准衡量人际、婚姻与家庭关系的轻与重;拓展公共活动空间,让年轻人的交往约会不再局限于各类消费场所,纠正“恋爱就是花钱”等消极想法,创建开放、积极的社会生活环境。

“要为农民工择偶提供平台和时间。”靳永爱认为,一方面,政府应该鼓励和扶持公共服务机构,为青年群体搭建信息互通的交友平台,企业之间也可以共同开展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,拓宽他们的社交网络;另一方面,要加强对企业的用工监督,保障农民工合法的休息休假权利,使其有更多时间经营生活和爱情。

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大背景下,部分年轻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,不再认为婚育是生命的必经之路。对此,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,社会在尊重多元化选择、给予年轻人更多空间的同时,也要加以正确引导,在职业发展、子女教育等方面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,创造更好的婚育条件。

新奇课程进高校,只是昙花一现?

《半月谈》邓倩倩

在一学期一度的“选课大战”中,最让学生期待的莫过于花样迭出的选修课。近年来,推陈出新的课程名称时常走进大众视野,爬树、三国杀、恋爱心理、电竞、品酒等应有尽有。瞄准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点,这些课程听者众多,有的课程学生扒墙翻窗来听,有的课程学生席地而坐,挤满整间教室。新奇“网红课”吸粉无数的背后,是来自各界的不同评价。

“潮玩”还是“潮学”?

早在多年前,新奇课程开始在个别高校崭露头角。2012年,厦门大学从国外引进攀树课,顾名思义就是借助绳索攀爬上树。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副主任翁兴和说,刚开始也有许多人不解,为何要开设这样一门看似无用的课,其实当中学问不少。

翁兴和介绍,这和小时候的爬树有所不同,它是利用绳索锻炼学生力量、灵活性、协调性的体育运动,许多爬树技巧可以在紧急时刻增加逃生率。选修过攀树课的学生李欣鑫说,上课就像在原始丛林中探险求生,有一种亲近大自然的特别体验,还能提升体能。事实证明,攀树课开设至今,一直都是抢手选修课。

一些新奇课程在学生中呼声极高,却被家长担心“玩物丧志”。近年,北京大学、中国传媒大学、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等高校开设了电竞游戏课程。有学生开玩笑说:“没打游戏,作业都做不出来。”也有人认为,将游戏名正言顺地搬上课堂,不利于学生未来发展。

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陈江解释,这门课并非鼓励学生玩电竞,而是让大家了解电子游戏有关的技术研发、媒体公关、心理建设等行业问题。未来电子游戏就业市场广阔,行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新

的需求,课程设置上应该予以回应。

如今,新奇选修课在各高校中越来越常见,逐渐颠覆传统大学课程的理念。高校开设恋爱课,很快一炮而红。“什么是亲密关系中的PUA”“学以致用交到对象,可以酌情给满分”……这一课程不仅吸引大量学生,同时还带火了授课老师。

新奇“网红课”能否成“品牌课”

记者调查发现,虽然新奇课程的名称抓人眼球,但经过课堂实践检验,真正成为“品牌课”的不算太多。

部分新奇“网红课”昙花一现。比如,一些高校开设马术、烹饪等课程,图一时新鲜,并未考虑到学校实际条件和学生长远发展,不但师资场地跟不上,而且难以保证安全,开设没多久就中途“夭折”了。

有的课程因重形式轻内容而沦为“水课”。有高等教育专家指出,部分高校跟风开设幸福课、恋爱课、社交课等,却没有足够的教学水平支撑课程内容,这些课程成为低门槛、少营养的“快餐课程”。有学生表示,有些开设的幸福课、恋爱课、社交课,不仅不能解决他们的情感困惑,连授课都显得很敷衍。比如,在课程设置上,有的课程由老师授课变成学生分小组自由展示,有

的课程总是“套路化”,这些都让选课学生感到失望。

在一次对大学生新奇课程的问卷调查中,大多数受访者认为,高校在新奇课程方面的教学计划和目标有待完善。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李非凡认为,一些新奇课程纯属搞噱头,名称虽然很另类,却无多少创新内容。有的娱乐性太强,科学性不足,拉低高校课程的专业水准。有的新奇选修课是给学生的“送分课”,教学内容不成系统,教学要求也不严格,滥竽充数。

要“新奇”更要有“新知”

教育学者认为,一门好的课程,要“始于兴趣,终于真知”。多数受访学生表示,大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,会有自己的判断,若只是冠个新奇的名词,无实质内容,学生是不会买账的,知识含量和实用性才是王道。

开设一门新课,师资培养、课程设置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。翁兴和说,厦门大学为开设潜水课,准备时间达到两三年,包括送教师到专业学校培训,考取潜水教练员证等。近年修过潜水课的厦门大学学生都具备基本潜水技能,有的甚至成为半专业的潜水爱好者。

“选修课增多,体现大学办学自主权扩大,是好事。”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同时指出,大学教师开设选修课存在比较随意、缺乏专业论证的问题。“开设哪些丰富多彩的选修课,需要大学教授委员会的专业判断,以此加强对选修课建设的规划、指导与论证。”

李非凡认为,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,都要将教育引领学生放在首位,而不能被流量和浮躁风气牵着鼻子走。